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外语教育与语言服务实践研究

安逸 杨展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昆明, 650504;

摘要: 在抗战时期, 西南联大外文系在梅贻琦的影响下, 构建起专业课程与公共外语课程相结合的体系, 学生们积极投身军队、广播等语言服务实践, 展现出强烈的家国担当。这些历史经验对当代外语教育在培养“通才”和强化语言服务能力培养等方面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西南联大; 外语教育; 语言服务; 人文素养

DOI: 10. 64216/3080-1516. 26. 01. 099

引言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特殊历史背景下, 由被迫南迁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一所特别大学。西南联大办学时间虽仅八年, 但在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及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就不可忽视, 尤其是在外语教育与语言服务方面, 其模式和经验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西南联大的外语教育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其师生积极投身抗战语言服务, 在译员培训、翻译服务、国际交流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成为抗战时期中国语言服务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 它还还为其他院系培养了通晓英、法、德、俄等语种的诸多博学宏才, 造就了王佐良、李赋宁、周珏良、许渊冲等新中国外语界巨擘。联大的外语教育与实践经验, 对于我国高等院校外语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西南联大外语教育的背景

1.1 历史沉淀

西南联大的外语教育建立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外文系的深厚历史积淀之上。北京大学的英国文学系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外国语言文学系科之一, 在蔡元培校长的领导下, 北大外文系强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形成了重视文学研究和人文素养的传统; 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肇始于 1926 年 5 月成立的西洋文学系, 该系制定了《西洋文学系课程总则》, 确立了“博雅之士”的培养宗旨; 南开大学以“文以治国”的理念设立文学组, 其英文系成立于 1931 年, 同样也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外语学科之一。总体来看, 三校外文系各有特色, 北大重学术研究, 清华重通识博雅, 南开重实用能力, 这种多样性为西南联大外语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 三校师生历经艰辛, 先后迁至长沙、昆明。在迁徙过程中, 三校外文系的师资力量

得以整合, 形成了强大的教师阵容。据统计, 先后共有 30 位教授在外文系任教, 其中包括吴宓、叶公超、柳无忌、陈福田、钱钟书、潘家洵等国内知名学者, 以及燕卜苏(William Empson)、吴可读(Pollard-Urquhart)、温德(Robert Winter)等外籍教授(常海潮, 2017)。

战时环境为外语教育与实践提供了独特的契机。昆明作为抗战大后方, 国际援华物资于此汇聚, 与盟国的交流日益频繁。这种时代背景促使西南联大的外语教育更加贴近现实需要, 同时也为师生提供了更多语言实践的机会。

1.2 外语教育理念与体系

1.2.1 “通才教育”

梅贻琦的“通才教育”思想是西南联大外语教育理念的核心支柱。他于 1941 年在《清华学报》明确强调“通识为本, 专识为末”, 他认为通识教育的不足是彼时大学教育的一大通病, 大学虽然应做到“通专兼顾”, 但其重心更应放在“通”而非“专”。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应是具有广博知识、通晓事理的人才, 在专业领域有深入研究的人才固然重要, 但地位次于通才。若让缺乏通识素养和全局观的专家来治理社会, 不仅不能教化民众成为“新民”, 反而会造就“扰民”的后果(梅贻琦, 1941)。

当然, “通识为本”并不意味着专识教育就不重要了, “先通后专”也决不意味着重“通”轻“专”, 而是通专兼顾, 通识为重。以通识教育为根基, 致力于培养人文素养深厚的外语通才; 在通识与专业之间, 坚持以通驭专、通专融合的价值取向。这一理念贯穿了西南联大的外语课程设置、师资选聘和外语教学的全过程(常海潮, 2017)。

1.2.2 课程设置

西南联大外语专业教育的课程设置充分体现了其

对学生文学素养与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重视。外文系课程体系由必修与选修两大模块构成，一、二年级期间，文学院共同必修课程占比四成，本专业必修课占六成。课程设置呈现出三个鲜明的取向，其一是强调知识基础的建构，低年级阶段要求学习多学科领域课程，体现博先于精的通识教育理念；其二，以文学教育作为人文精神培育的核心载体，通过大量文学作品研读及专门设置的人文主义课程，引导学生对生命、社会伦理及文化问题进行深层反思；其三，在语言能力培养上采取整体性路径，摒弃将听说读写机械割裂的传统模式。这些课程为学生提供了扎实的文学基础，强化了其整体语言表达能力与逻辑思辨能力（常海潮，2017）。

西南联大全校范围内的公共外语课程设置同样体现了其对学生跨学科素养的高度重视。在抗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公共外语课程被设计为全校必修课，其内容涵盖了基础语法、阅读理解以及写作技巧等多个方面。对于英文课，全校一年级学生都需修习，在此阶段主要讲授现代短篇英文散文。进入二年级后，文、法学院学生不仅需继续学习主讲散文的英文课，还需选择第二、第三外语进行学习直至毕业。文、法学院的学生多选修法语，而理、工学院学生则多选修德语。此外，由于联大对于选修课程的限制较少，非外文系的同学除了基础的语法和阅读课，同样可以选修外文系的高级课程，从而进一步服务于他们的专业学习（罗燕，2020）。

1.2.3 师资配置

西南联大外文系之所以能够在抗战时期取得卓越成就，离不开其汇聚的一批中外名师。这些教授既有三校原本的教师，也有学成归来的留学生，更有在战火中与联大生死与共的外籍教师。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共有30位教授曾在联大外文系任教。这些教授从始至终贯彻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的理念，把课堂从枯燥乏味的填鸭式教学转变为思考导向的实践练习，要求学生们不墨守成规，努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通过在课堂上的启发性提问，推动学生们进行独立思辨。

许国璋先生（1995）曾回忆道，学校的砖木结构用房简陋，却迅速汇聚了一批名师。当时“中文系朱自清、闻一多、浦江清、罗常培、钱穆，哲学系金岳霖，外文系吴宓”及英籍教授燕卜苏均已到位，学生仅有一百多人，而图书馆也只有“牛津《世界名著》丛书，新从香港运到”。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教授们不仅“床位，桌椅，教室，饭食”安排妥当即开始授课，更以他们深厚的学养与严谨的态度，奠定了联大外文教育的卓越品格；吴宓教授作为欧洲古典文学的资深学者，他“匆匆

南行，未曾带书”，却坚持讲授荷马史诗，其备课时“必林间散步，逐章回忆，尽得细节而后返”。英籍教授燕卜苏作为“剑桥优等毕业”的诗人批评家，对学生作业则有一套极具特色的作文批改哲学：“文法有误，或不改，或改而不评；行文不贯，改，偶或加评；文不达，而有思想，助其达；文字华丽，作老生之谈，指出其空泛；文达而无新解，不评，也不给好分；文达而有新解，小误不足病”。钱钟书先生于1938年来到联大后，讲授“欧洲文艺复兴”与“当代文学”，其课程“总有新意”。他课前必写好讲稿，但课上从不翻阅，其讲授既能做到语句洒脱、论述自然，又能避免冗长拖沓。

这批兼通中西、融贯古今的学者共同构筑了战时联大外文系独特的学术生态。这种通识取向的师资配置，使得西南联大外文系在战时流离之际，不仅传授了语言技能，更培养了具有批判思维与独立人格的“全人”，从而达到了“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的教育境界（许国璋，1995）。

2 西南联大的语言服务实践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促使中美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迅速深化，对英语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飞虎队（Flying Tigers）是1940年8月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于1941年8月1日在昆明组建的美国志愿航空队，主要负责“驼峰航线”护航及空袭日军等任务。

应征的外语人才绝大多数来自后方高校，而西南联大无疑是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一所。为配合新成立的“飞虎队”作战，军事委员会于1941年秋成立了“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干部训练班”，时人称之为“战地服务团译练班”，又简称“昆明训练班”。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倡议该校四年级的男生应征，而许渊冲、吴琮、罗宗明等三十多位同学都报了名（许渊冲，2021）。该班的班主任是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他向西南联大推荐潘光旦、闻一多和吴泽霖三人，请求派出一人主持班务，最后联大选择由吴泽霖担任副班主任，外文系陈福田教授也参与工作，联大的部分教授同样也受邀出任教师，如赵九章教授讲气象学，皮名举教授讲美国史地，温德教授讲英文词汇学等（许渊冲，2021）。应征译员的服务范围覆盖了飞行队的不同层面，包括情报翻译、战场联络、军事训练和后勤协调。

然而，这一群体也面临一些困境。译员们的自我身份认知便是最大顾虑，译员们在行政上归属中方外事局管辖，但外事局并不了解译员工作的具体情况，他们的工作实际上受美军支配，然而美军对他们又没有晋升和

奖惩权。他们空有行政级别,但没有军衔,不能佩戴领章,外事局也没有落实征调时许诺的入职三级翻译官对应少校或上尉待遇。他们实际上是以非官非兵的身份参与工作,不仅时常感到不便,还会受到部分美方人员的轻视(肖志兵等,2018)。残酷的战地环境同样考验着译员的身心,译员们奔赴印缅前线需面临极高的风险和艰苦的条件,外文系1944级朱晦吾同学和电机系1945级沈宗进同学就是在穿越野人山上空失踪的(闻黎明,2010)。前线的生活也极为艰苦,营房往往十分简陋,物资供应匮乏,时常存在饿肚子情况(李金莲,2024)。还有译员被分配到基层作战单位,他们长期处于近距离战斗环境,与战斗人员一同承担着生命危险,甚至有译员在战斗中牺牲,其中就有外文系的缪弘同学(闻黎明,2010)。

联大的同学亦有参与后方舆论战斗的实践。抗战期间,昆明广播电台为完成国际宣传重任,先后开办了英语、法语、日语、马来西亚语四种外语广播节目,这些电台“几乎全由联大师生主持播讲”。其中,英语节目于1940年10月1日开播,由联大政治系学生高葆光负责编播;法语节目由联大外文系教授陈定民、吴达元等担任播讲;日语节目于1942年10月开播,由联大政治系学生刘祚昌协助编播,后由联大师生承担收听、编译、播音的全套工作;马来语节目于1942年10月开播,由联大化学系学生黄克峰担任编播(戴美政,2015)。这些外语广播通过昆明电台远播至东半球各地,成为西南联大外语教育服务抗战的重要实践平台(戴美政,2015)。

3 西南联大外语教育对代外语教育的启示

西南联大的外语教育以培养通才为核心,秉持通专兼顾、以通识为主的理念,这种教育思想对当代外语教育仍具一定启示。在全球化背景下,外语教学不应局限于语言技能训练和提高专业考试通过率,而应着眼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联大的经验表明,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能使学生在掌握扎实语言能力的同时,具备可观的知识底蕴。

从课程建设来看,联大坚持多层次、立体性的设计原则,既开设大量通识课程,又保留专业必修课与选修课的灵活性,允许学生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深入钻研专业领域和自己感兴趣的方向,让学生在开阔学术视野的同时,能够逐步聚焦专业方向,实现知识结构的优化。当前外语教育中还存在通用英语与专用英语之争,前者强调语言基础与综合素养,后者注重专业领域应用能力。联大的实践提示我们,二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

而是递进融合的统一。学校应在有限的学分体系内,结合学生发展需求与社会人才标准进行系统性设计来实现通专兼顾、避免课程内容的碎片化与重复化。

在教学方法上,联大广泛采用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培养了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也激发了其创新思维。这种教学方式对改进当前部分外语课堂“填鸭式”教学方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联大外语学生在抗战时期积极参与军事翻译、外交沟通等语言服务实践,实现了从课堂到战场的转变,体现了高等教育服务社会与国家的功能。当代外语教育可通过增强校企合作、拓宽专业对应的实习项目等方式,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运用所学,提升实践能力与社会责任感,此举不仅能帮助学生明确职业方向、确立合理的职业规划,也能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 [1] 常海潮,2017. 博而返约,通而入专——西南联大外语通识教育模式及其当下启示[J]. 外语教育研究,5(2):20-25.
- [2] 戴美政,2015. 抗战救亡的时代强音——昆明电台与西南联大对抗战广播的重大贡献(下)[J]. 中国广播(12):82-86.
- [3] 李金莲,2024. 从“随军译员”看西南联大精神的融通与实践——以外语系被征调的卢绍华及其家属为例[J].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39(5):128-139.
- [4] 罗燕,2020. 西南联大公共外语教育探析[J].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39(1):116-120.
- [5] 梅贻琦,1941. 大学一解[J].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00):1-12.
- [6] 闻黎明,2010. 关于西南联合大学战时从军运动的考察[J]. 抗日战争研究(3):5-18.
- [7] 肖志兵,孙芳,2018. 抗战时期中国翻译官的身份与角色[J]. 外国语文,34(5):120-126.
- [8] 许国璋,1995. 回忆学生时代[J]. 外语教学与研究(2):74-78.
- [9] 许渊冲,2021. 许渊冲百岁自述[M]. 北京:华文出版社:427.

作者简介:安逸(1999.05-),男,汉族,重庆人,硕士在读,云南民族大学英语口译专业。

云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外语教育与语言服务实践研究”(2024SKY082)